

# 比较高等教育：学科 概念、历史发展与现实困境

袁传明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 比较高等教育是指运用比较法研究世界各国中学后各级各类教育的基本问题以及热点问题的一门应用性较强的交叉学科,具有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等特征。比较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描述借鉴阶段、多学科视角阶段、反思建构中的合作与交流阶段,它的方法论来源于比较教育学,但它也可以为高等教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野和实践方向。在全球化背景下,当前的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中存在理论基础的薄弱、比较法的缺陷、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团队合作的矛盾、话语体系的建构等问题,这对学科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关键词:** 比较高等教育; 学科; 复杂性; 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 G640-05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614(2021)08-0071-09

DOI:10.19903/j.cnki.cn23-1074/g.2021.08.012

比较高等教育是两个二级学科比较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学相互交叉融合形成的一门三级学科。潘懋元先生曾于1991年发表《比较高等教育的产生、发展与问题》一文,在国内较早地对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诸如研究对象与意义、方法论、热点问题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剖析,观点精辟,论述中肯,为我国学者了解20世纪90年代以前比较高等教育学科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极具学术价值的观点。作为研究领域的学科,比较高等教育还处于不断演进和发展过程中,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较为丰厚的成果,不乏一些重要的理论探索和标志性的著作,但在学科的性质与缘起、研究对象与方法、目的与意义等基本问题上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尤其是对于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近30年来的动态与困境,目前尚未有专文涉猎。本文立足于探讨上述这些问题。

## 一、学科概念: 性质与缘起、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目的与意义

### 1. 性质与缘起

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比较高等教育的产生缘于社会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西方高等教育蓬勃发展,逐渐成为国家与社会改革的中心,并扮演着知识生产的重要角色。政府在制定本国高等教育政策时开始关注他国的经验,以英国1963年发表的《罗宾斯报告》(The Robbins Report)为例。1961年2月,英国首相麦克

米伦成立了以罗宾斯爵士(Robbins Lord)为主席的全国高等教育调查委员会,考虑到英国国内高等教育改革与扩展的需求,该委员会实地考察了美国、苏联、法国、联邦德国、荷兰、瑞士、瑞典等国的高等教育,并对各国高等教育进行了比较<sup>[1]</sup>。在借鉴他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基础上,《罗宾斯报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改革与建议都迅速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认可,由此奠定了它在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意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著作,这都表明世界各国政府对他国高等教育经验的迫切需求与了解。比较高等教育这个领域若没有刺激因素,它就不能“自然地”演化成一个学术研究领域<sup>[2]</sup>。正是这个“社会需求”的刺激,注定了比较高等教育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但它的应用性又不同于自然学科,不指向实际日常生活,更多的是指向政府的政策制定,乃至促进本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关于比较高等教育产生的具体时间是很难确定的,但学界有一个共识,即比较高等教育的产生晚于比较教育学,而且它“至今很难像一般比较教育学那样,确定一位像朱利安(M. A. Gulien)那样的教育家作为创始人,并以其《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与初步意见》一书出版年份(1817年)作为建立学科的起点”<sup>[3]</sup>。

### 2. 研究对象

探讨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对象,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分析:一个维度是国别层面;另一个维度是具体的研究内容。国别层面的研究对象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包括

收稿日期: 2021-01-23

基金项目: 扬州大学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学会育人与学会教学的逻辑悖论及其化解”(编号: YZUJX2019-31C)。

作者简介: 袁传明,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 比较高等教育与外国教育史。

本国高等教育和欠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符娟明在《比较高等教育》中只研究了苏联、美国、联邦德国、日本和法国的高等教育,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涉及中国的高等教育,略显遗憾,但在后期杨汉清、袁祖望等人的著作中均已涵盖中国高等教育。事实上,本国高等教育是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美国是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对象,而美国人自己在研究比较高等教育时也极为关注对本国自身的研究。以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为例,该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资助巴巴拉·伯恩(Barbara B. Burn)、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约瑟夫·本-戴维(Joseph Ben-David)等人出版了《九国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Nine Countries, 1971)和《学术中心: 英国、法国、德国、美国》(Centers of Learning: Britain, France, Germany, United States, 1977),同时还邀请国外学者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如匈牙利学者本·戴维的《美国高等教育》(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1972)、日本学者道夫纳吉(Michio Nagai)的《黄昏前的猫头鹰》(An Owl before Dusk, 1975)、法国学者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的《美国社会中的学术系统》(The Academic System in American Society, 1974)和英国学者埃里克·阿什比(Eric Ashby)的《任何人,任何研究: 一项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Any person, any Study: An Essay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1)。所以,本国高等教育是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对象。从当前的研究趋势和热点来看,欠发达国家已成为比较高等教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例如,美国波士顿学院创办的《国际高等教育》季刊设有专栏介绍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

在具体研究内容上,从广义来讲,比较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学并无二致,即中等教育以上程度的各级各类教育的一切问题<sup>①</sup>,例如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与法规、调整与布局;中观层面的院校治理、大学理念、政府与大学、教育经费;微观层面的教师与学生、课程与教学、组织与制度、科研与服务、招生与就业等。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很少有比较高等教育的专著涵盖高等教育学的全部内容,大多是围绕几个专题或主题展开比较研究,例如符娟明研究了高等教育的结构、招生制度、本科生教学、科学研究、研究生教育、师资和教育管理;巴巴拉·伯恩研究了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学生、组织与制度、教育经费等;杨汉清研究了高等教育的结构与功能、教学与科研、行政与管理;袁祖望研究了高等教育的管理制度与结构、招生、教学、科研、教育经费、师资;等等。因此,从上述文献分析来看,比较高等教育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政策与法规、大学理念、教学与科研、教师与学生、组织与管理、招生与就业等;此外,还有社会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如国际化、跨学科、院校治理等。这表明比较高等教育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在不同历史时期,它有不同的研究主

题,主要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求。阿特巴赫总结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问题,即高等教育的计划工作、教授职务、管理、大学和社会关系、学生的行动主义。潘懋元指出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热门话题:大学与社会关系;高等教育的价值、培养目标(包括个性发展、通才教育、社会适应性、职业准备等);高等教育(中学后教育、第三级教育)体制多样化;终身教育与继续教育的理论与形式;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一体化(包括产学研协同、合作教育等);大学课程改革;大学生数量剧增(发展中国家)、下降所带来的问题;招生制度与毕业生就业;高等教育地方化;高等教育投资以及公私高等学校体制;大学管理改革、社会参与与大学生参与;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包括留学生政策、人才外流等)<sup>[4]</sup>。21世纪前十年,我国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主题集中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结构与管理、教学与科研、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私立高等教育等方面<sup>[5]</sup>;西方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重心在于高等教育公平、现代大学制度和质量提升等三大主题<sup>[6]</sup>。

### 3. 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比较教育学是比较高等教育的母系学科。如要准确运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各类方法,首先要明确“方法”有两个层面:一是方法论层面的方法;二是具体技术层面的方法<sup>[7]</sup>。比较法在任何比较研究最为根本的思维基础,比较的形式有同类比较与异类比较、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比较方法论思想,例如汉斯(Nicholas Hans)的历史-因素分析法、马林森(Vernon Mallinson)的民族性研究法、劳锐思(Joseph Lauwerys)的哲学研究法、莫尔曼(Arthur Moehlman)的文化理论模式研究法、贝雷迪(G. Z. F. Bereday)的比较四步法、诺亚(Harold I. Noah)与埃克斯坦(Max A. Eckstein)的科学量化法、霍姆斯(Brian Holmes)的问题法、埃德蒙·金(Edmund J. King)的教育决策五层次研究法等。具体技术层面的方法有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实地观察法、访谈法、内容分析法、二手数据分析法、话语分析法等<sup>[8]</sup>。为了研究高等教育面临的新问题,一些比较高等教育学者开始借鉴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来构建新的方法论基础,他们尝试跨国的团队合作,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法、多个案例研究、从微观到宏观的数据收集以及各种不同的分析技术来连接分散的分析水平和模块<sup>[9]</sup>。可见,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方法来源于比较教育学,并且正在努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

### 4. 目的与意义

作为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起初,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为解决现实问题,为国家的政策制定与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借鉴和参照;后来,随着研究者的兴趣和个人偏好被带入研究过程,学科自觉意识日渐增强,形成了专业的研

究团队,定期出版学术刊物和举办学术会议,例如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从1995年开始每年出版3-5期的《国际高等教育》(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由国际高等教育协会(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每年举办一次的学术年会等。所以,当今的比较高等教育在没有改变“初衷”的基础上,又有了更为丰富的意义与内涵。首先,大力开展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可以吸取他国高等教育改革经验,加强对本国高等教育的认识,从而有助于改进本国高等教育;其次,比较高等教育是探索世界高等教育内外普遍规律的重要路径之一,它有助于发展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与实践;再次,比较高等教育强调多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与融合,它丰富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最后,比较高等教育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因此它可以在文化教育交流过程中深化国际理解,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国际高等教育系统与机构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认为,在高等教育内部,“比较研究”这一笼统概念是指不同国家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的跨国或跨文化比较研究;在广义的术语层面,这类研究被定义为在至少两个实体之间的跨国、跨地理和跨文化边界所进行的观察和收集数据的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并且在比较研究中系统地联系这些实体<sup>[10]</sup>。通过对学科性质、对象、方法、目的与意义的分析,在参考国外文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比较高等教育是指运用比较法研究世界各国中学教育以后各级各类教育的基本问题以及热点问题的一门应用性较强的交叉学科,具有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等特征。比较高等教育是比较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学共有的分支学科,比较教育学与它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随着比较高等教育的成熟与发展,它不断丰富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促进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为研究者提供更广阔的学术视野。

## 二、历史发展: 描述借鉴、多学科视角、反思建构与合作交流

潘懋元先生认为,广义的比较高等教育是与高等教育学同时产生的,因为一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多是从外国引进而后加工的。例如,美国的高等教育,是从英国、德国引进而后发展成为美国式的;日本的高等教育,先从荷兰、德国引进,后来又从美国引进,但都与日本文化传统融合,形成了日本式的;东南亚的高等教育,大多数模仿英国(也有的曾模仿荷兰、西班牙),其后又受美国影响<sup>[11]</sup>。比较研究的对象至少涉及两个,即一国内部多个要素的比较或两国之间的比较。高等教育的移植往往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美国移植英国学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不能认定比较高等教育随之产生,而借鉴德国大学的经验改造本国高等教育,则属于比较高等教育的典型范畴。因此,比较高等教育的产生应在各国普遍建

立起本国的高等教育之后,在反思本国高等教育的基础上,由改革的需求促进了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开展,从而使这门学科不断成熟与发展。

### 1. 19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 描述借鉴阶段

比较高等教育产生的标志性创始人及代表作已很难确定。因为西方国家在早期具有游学教育的传统,许多关于比较高等教育的论述散见于旅行者的日记、信函、通讯报道、著作等之中,例如,俄国著名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在1857年第一次游学法国时对其高等教育深有感触,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到“我是一个贫乏无知的人,我的这种感觉在哪里也没有在这里这样强烈……再者,艺术享受,罗浮宫、凡尔赛宫、音乐学院、剧院、法兰西学院和巴黎大学的讲课,而主要的是享受社会自由,对于这种自由我在俄国甚至一无所知。”<sup>[12]</sup>再如英国伦敦大学的建立。1825年2月,苏格兰诗人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在游历欧洲之后萌发了在伦敦建立一所大学的想法,随即在《泰晤士报》上致信英格兰政府官员,公开声明“我建议的计划是建立一所大伦敦大学(a great London University)。”<sup>[13]</sup>这封信在英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吹响了近代英国新大学运动的号角<sup>[14]</sup>。

德国马尔堡大学西方文学教授维克多·艾姆·休伯(Victor Aimé Huber)分别于1839年和1840年出版的两卷本《英国大学》(Die Englischen Universitäten)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比较高等教育学科早期发展阶段最具代表性的著作<sup>②</sup>。青年时期的休伯曾游历过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归国后在不莱梅大学、罗斯托克大学、马尔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担任过现代语言学、东方语言学、文学史教授,是著名的社会改革家。该书的英文版是由英国红衣大主教亨利·纽曼的弟弟、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前院士、曼彻斯特新学院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教授弗兰西斯·威廉·纽曼(Francis William Newman)翻译的。英文版和德文版的篇章结构有一定调整:德文版第一卷七章,第二卷七章;英文版第一卷八章,第二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三章,第二部分为注释和附录。《英国大学》不单单是“一本对国外高等教育描述性的专著”,该书研究了从12世纪到18世纪英国大学的变革与发展,实际上是关于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史的著作。弗兰西斯·纽曼在英译版的前言中开篇即说“呈现在英国读者面前的是一部关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通史著作,时间范围从最早起源时期至1688年英国大革命的自然终结。”<sup>[15]</sup>诸如此类的大学史研究还有很多,比如西蒙·萨默维尔·劳里(Simon Somerville Laurie)的《大学的起源与早期组织:一项中世纪教育的调查》(The Rise and Early Constitution of Universities, with a Survey of Mediaeval Education, 1886)、海斯汀·拉斯达尔(Hastings Rashdall)的《中世纪的欧洲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1895)等。上述类似研究大多

是运用比较法或是从比较的视角来开展高等教育史(如大学史等)研究的,其研究缘起大多是学者的研究兴趣,很少能体现出是国家和社会改革的需求。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受德国柏林大学的影响,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比较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美国著名教育家亨利·菲利浦·塔潘(Henry Philip Tappan)1851年出版的《大学教育》(University Education)一书被认为是“第一本较系统介绍普鲁士大学模式的著作”<sup>[16]</sup>。该书是塔潘考察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大学教育的基础上写成的,通过比较发现,他认为德国大学具有优越性,主张把美国州立大学办成像德国的研究型大学那样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塔潘对德国大学优越性的论证以及对美国州立大学改革的主张,受到密歇根大学的关注,1852年他便被任命为该校校长,此后塔潘就成为美国州立大学“德国化”的积极推动者。1874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哈特(James Hart)出版了《德国大学:个人经验的叙述》(German Universities: A Narrative of Personal Experience)一书,他通过自己在哥廷根大学的求学经历,描述了德国人心目中的大学理想。哈特在该书中还对德国大学和英国大学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德国大学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主张美国的英式学院应按照德国大学模式进行改革。美国西储大学校长查尔斯·富兰克林·施文(Charles Franklin Thwing)1911年出版的《世界的大学》(Universities of World)和1928年出版的《美国和德国大学的百年史》(The American and the German University: On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是这一时期有关美德之间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成果,尤其是后者。施文的《美国和德国大学的百年史》研究了美国高等教育借鉴德国大学发展经验的历史,包括最早求学于德国大学的美国学生、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德国教师、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等。通过历史分析与比较,施文得出结论“美国学院和大学生活中的德国世纪不久或许再次出现,但这不是最终的定论,不可避免的是,德国世纪已经结束,并且一去不复返!它是高等教育史上一座永恒不朽的丰碑。”<sup>[17]</sup>

20世纪30年代至“二战”前后,比较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大学学术危机的刺激,其最典型的著作就是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1930年出版的《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在阐述现代大学理念的基础上,以美国大学的学术危机为出发点,弗莱克斯纳考察了英国和德国大学,并对美、英、德等三国的大学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克拉克·克尔在为1994年再版的《现代大学论》所作序言中指出,到20世纪90年代,《现代大学论》仍然是一本伟大的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弗莱克斯纳撰写了第一本现代高等教育系统的比较研究专著,为阿什比、本-戴维和伯顿·克拉克的经典著作提供了参照<sup>[18]</sup>。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有关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著作还有沃尔特·科奇尼(Walter Kotschnig)的《变革世

界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a Changing World, 1932)和《学术职业中的失业问题:职业与教育计划的国际研究》(Unemployment in the Learned Professions: 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Occupational and Educational Planning, 1937)、约翰·塔特·兰宁(John Tate Lanning)的《西班牙殖民地的学术文化》(Academic Culture in the Spanish Colonies, 1940)、弗雷德里克·李尔格(Frederick Lidge)的《学术的滥用:德国大学的失败》(The Abuse of Learning: The Failure of the German University, 1948)等。

比较高等教育学科在早期发展阶段以借鉴描述为主要特征,在研究对象上以美、英、德、法等发达国家为主,在研究方法上以实地观察、历史分析、文献分析、经验描述为主,在研究内容上以研究型大学、学术自由与学术危机等问题为主,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改造本国的高等教育。

## 2.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多学科视角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5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有了极大的发展,根据相关统计,全世界大学总数的三分之一都是在1945年以后建立的<sup>[19]</sup>。因此,比较高等教育学科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迎来了发展的契机。在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民主化浪潮、终身教育思想的推动之下,各国政府纷纷致力于本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使之能适应经济的振兴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在此过程中,对他国高等教育经验的了解与借鉴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的比较高等教育研究成果,阿特巴赫在《比较高等教育》所列的1117个文献中的99%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献,涉及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等60多个国家。该时期除了具有早期借鉴描述的特征以外,这些文献中还呈现出从多学科视角研究的特点,以下将以几位重要代表人物及相关著作加以说明。

埃里克·阿什比是英国著名的比较高等教育专家,他从生物学的视角研究了英国、德国、印度、非洲等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著名的“大学遗传环境论”,代表作有《非洲大学与西方传统》(African Universities and Western Tradition, 1964)、《英国、印度、非洲的大学: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Universities: British, Indian, African: A Study in the Ec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 1966)、《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Adapting Universities to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1974)等。阿什比首先是一名杰出的生物学家;其次,他在多所大学担任教授职位,之后走上大学管理岗位,是一名出色的大学管理者。阿什比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运用到高等教育移植的比较分析过程中,认为大学像动物和植物一样地不断向前进化,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有机界中和大学中一些新心态的出现,都要经过更新或杂交的过程<sup>[20]</sup>。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内在逻辑类似于生物体系中的基因,大学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移植过程中都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英国

与美国对德国大学的移植存在较大差异,印度和非洲对英国大学的移植同样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大学在移植过程中除了要遵循内在逻辑以外,还要考虑到本国的适应性,由此才能实现进化,使“各所大学自身的方式都毫无例外地染上了民族色彩”<sup>[21]</sup>。阿什比研究的高等教育移植的“适应过程”发生在殖民地背景下,殖民地背景现在几乎成为历史,但是这两个“条件”之间的适应过程仍旧绝对必要——一方面是目前形式的普及的 *studium generale* 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自己的社会”的要求<sup>[22]</sup>。

约瑟夫·本-戴维出生于匈牙利,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教授,曾任美国大学的社会学和教育学教授,是当代科学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本-戴维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不同国家的社会机构和科学组织(包括大学)对科学进步的影响,并作出较为深入的历史比较分析,其代表作有《基础研究与大学》(*Fundamental Research and Universities*, 1968)、《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 比较的视角》(*The Scientist's Role in Society: A Comparative View*, 1971)、《学术中心: 英国、法国、德国、美国》(*Centers of Learning: Britain, France, Germany, United States*, 1977)等。本-戴维是一名跨学科的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他接受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资助,开展了大量的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其成果受到了同行的高度评价。本-戴维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考察了近代以来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科学的体制化演变和学术中心转移的现象,认为美国大学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学者们倾向于用标准化的方法设计出复杂而精致的组织构造。因此,美国大学各系、研究所和实验室的组织规模和复杂程度很快超越了欧洲的同类机构。到30年代,甚至在30年代之前,欧洲的科学家在某些领域就不再能有效地与美国同行竞争了<sup>[23]</sup>。本-戴维教授的贡献是非常恰当地考察了全世界高等教育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建立起大学教育模式的重要国家,并在其诊断的基础上提出一些补救措施<sup>[24]</sup>。

菲利普·G·阿特巴赫是这一时期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一位青年才俊,他借鉴了当时经济学中盛行的依附理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高等教育进行了比较分析。1979年出版的《比较高等教育》一书奠定了他在比较高等教育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这一时期他还出版了《国际比较视角下大学对社会需求的响应》(*University's Response to Societal Demand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1975)、《发展中国家的教育: 精选文献书目》(*Higher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Nations: A Select Bibliography*, 1970)、《第三世界的高等教育: 主题与变因》(*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Themes and Variations*, 1987)、《从依附到自主: 亚洲大学的发展》(*From Dependence to Aut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 Universities*, 1989)等。阿特巴赫试图用经济学中的依附理论来揭示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向第三世界移植

过程中产生的不平等及其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所谓的“依附”就是过去殖民地时期被殖民化地区对殖民者的依附,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依附于工业化国家,处在世界教育和知识体系的“边缘”,无法脱离工业化国家构成的“中心”,第三世界高等教育之于发达国家教育的关系就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sup>[25]</sup>。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这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高等教育依附理论已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认为该理论忽视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后发优势,忽略国际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积极输出的一面,否定未来新的高等教育国际秩序出现的可能性,未能全面客观阐释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现实,存在很大的思想局限性<sup>[26]</sup>。

伯顿·R·克拉克(Burton R. Clark)是美国著名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他是这一时期运用多学科视角研究高等教育的最典型代表,相关成果有《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Academic Power: Patterns of Authority in Seven National Systems of Higher Education*, 1978)、《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1983)、《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eight disciplinary and comparative views*, 1984)、《研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Places of Inquiry: Research and Advanced Education in Modern Universities*, 1995)等。克拉克是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但其研究比较高等教育的视角不仅限于社会学视角,例如《学术权力》一书就是其团队利用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分析模式,对德、法、意、日、美、英等国的学术权力结构进行的比较研究。《高等教育新论》从历史、政治、经济、组织、文化、政策、科学、社会学等八个学科的视角,对多国的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比较分析。《高等教育新论》是八位国际知名学者的集中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早期的实地考察、文献分析、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技术,采取多学科的观点,从高等教育实际出发,形成专题研究报告,从而开辟了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新路径,不失为一部有关“比较高等教育方法论的专著”<sup>[27]</sup>。克拉克首次从组织的视角,把高等教育系统看作由生产知识的群体构成的学术组织,他认为工作、信念和权力是该组织的基本要素,各国高等教育系统对相关要素的依赖程度有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力、市场体制和学术权威这三者的相互博弈中形成了复杂的学术系统,它既有序又无序,在这种有序和无序的作用中相互激励。高等教育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产生并维持反变革的倾向来限制变化。或许,变化与反变化的矛盾对于适应机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个适于应变的体制正是靠着无序和有序之间的对立,才免于一成不变的<sup>[28]</sup>。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高等教育学科的蓬勃发展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当时亟须了解国外高等教

育的发展概况,为此我国出版了一系列介绍国外高等教育现状的著作,例如《高等教育的现状和趋势》(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国教育丛书》编辑组,1979)、《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国教育丛书》编辑组,1983)等。我国学者周南照先生1982年还曾撰文专门介绍了比较高等教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正式创建,认为“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结构、管理、内容和方法等的比较,更深入地了解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为认识和解决本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提供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参考”<sup>[29]</sup>。

### 3. 21世纪前后至今:反思建构与合作交流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后,比较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仍然没有削减的势头,各国都成立了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国际组织(如OECD、UNESCO、World Bank等)也加入了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行列,这大大增强了国际合作交流的力度与深度,学术刊物和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版以及国际研究团队与组织的正式确立,都预示着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特定的学术文化与氛围正逐步形成。在这一时期,一些比较高等教育学者开始关注学科自身的发展问题。

德国卡塞尔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乌尔里希·泰希勒(Ulrich Teichler)较早地开展了比较高等教育学科的反思性研究。泰希勒认为,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很少是基于明确的理论基础,一些比较高等教育研究项目的前期设计非常精细,但由于忽略了复杂的背景因素而往往导致结论过于简单。比较高等教育学科面临的诸多问题源于实践本身。昂贵的项目看似获得了丰裕的资助,但其研究受制于当前的政治因素;语言的障碍与知识领域的隔阂通常会影响信息的流通与共享;由于学派思想的异质性、不断上升的研究成本、不同的工作方式等,国际合作的研究团队会变得脆弱不堪,但这些问题并不能使我们质疑比较高等教育这门学科的重要性。泰希勒指出,关于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信息在解构基于狭隘经验的概念思维与推理方面成就显著,对概念建构的早期阶段来说,比较研究就是一座金矿<sup>[30]</sup>。如果建立一种半结构化的研究设计,那么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前景在理论和方法论上都值得期待,当然与理论和实践密切相关的具体问题从一开始就应该被明确地表述出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对比较高等教育学科的建构与发展进行了反思性的研究,出现了像《比较高等教育概论》(杨汉清,1997)、《高等教育比较学》(袁祖望,1999)、《比较高等教育》(谢安邦,2002)等这样的理论研究成果。

理论基础薄弱是阻碍比较高等教育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方法论不仅影响了这门学科的生存与发展,甚至还阻碍了国际合作团队的研究工作,因而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部比较高等教育方法论专著——伯顿·R·克拉克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探讨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背后的方法论基础还在继续,它是21

世纪前后比较高等教育学科反思与建构中的重要内容。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指导的比较研究,以探明大学结构与活动的某些特征为何成为可移植的“最佳实践”以及这种可移植性是如何影响世界各地的话语和实践的<sup>[31]</sup>。以结构功能或系统理论为基础的方法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到许多学者的推崇,但在此类跨国比较研究中很难获得理论概念的明确阐述,含蓄的本体论假设是其基本特征,而且注重个别差异分开比较,缺乏理论联系或者基础背景因素分析。社会动力学可为比较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因为它关注的是高等教育系统和机构在一定的场域和社会背景中相互作用的事实,发生在时间、空间和背景中的这些关系结合在一起就为高等教育系统和机构提供了不同的社会动力学<sup>[32]</sup>。比较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可从社会动力学方面获得益处,因为它较少关注高等教育系统的相似功能,其目标是找到有效的等价物,而且高等教育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系统理论和比较社会学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将权力组织看作子系统,因此有学者倡导以迈克尔·曼为代表的权力资源分析,并以此为基础修正社会动力学的一般模式,为比较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一个更明确的方法论基础<sup>[33]</sup>。如果我们继续把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作为一个单元来分析,那么我们尤其应该关注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的社会动力学,因为所有高等教育系统都是嵌入他们的传统和社会背景的,更不可能逃离历史束缚。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所有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重要因素以及各要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需要借助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来理解不同的政治行为动机<sup>[34]</sup>。定量研究工具的应用也可提升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质量。在比较研究的定量工具中,统计技术与数学处理对于发现和区分相似性和差异性非常重要,但在使用时要注意研究设计结构的准确性和比较法使用的范围、定义概念和指导调查研究的最终理论、概述实证调查的方法论问题、认识到所选方法的局限性、考虑到国家/机构的特殊性和研究领域/部门/学科的特殊性等<sup>[35]</sup>。当可靠的统计分析和指标设计可以使用时,定量研究就不仅仅是定性研究的有效补充,更重要的是定性与定量的混合研究方法以及三角测量技术可以将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证基础提升得更高。

还有学者基于国际期刊数据库,利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回顾并分析了21世纪前后20年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状况,认为虽然高等教育发展的全球趋势在普遍扩散,但近二十年(1992-2012年)的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sup>[36]</sup>。在国际比较研究中,国际合作研究的文献占据越来越多的份额,这表明国际合作已是当前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趋势,但近二十年国际合作的研究现状仍然呈现出“中心—边缘”的现象,以美国、英国和日本为“中心”,中国紧随其后,韩国、巴西和土耳其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由于不同国家的国际研究团队存在复杂的研究团

队动力学 因此 国际合作比较研究通常意味着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来协调各种事务 包括理论框架、方法论问题、实证工作等 因此 一项国际合作研究成果的正式出版往往要花费两三年的时间。研究团队的国际化和多样化是当今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特点。基于信息交流技术的国际合作研究强调 在使用不同的信息交流技术工具进行沟通时 不同的人(包括不同的代际、国家、文化、学科、机构设置、职业阶段等)不可能坚持一种的解决方案。研究团队成员构成的多样化与复杂性给广泛的国际合作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在完成一个共同目标的前提下 要将不同社会背景的研究成员按照各自不同的思想和方法论来研究相关问题并最终达成共识也绝非易事。戴尔·巴格肖(Dale Bagshaw)等人认为 国际研究合作是一个重要的、复杂的和脆弱的过程 管理不可避免的冲突需要一些有效的策略 例如 重视多样性和发展合作目标、进行自我反省和反思活动、促进合作对话、花费时间和发展信任等<sup>[37]</sup>。不可否认的是 一个高效的国际合作研究团队需要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信任与包容 这也是当前比较高等教育学科在反思与构建中所秉持的一贯原则。

### 三、现实困境

当前 比较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出研究团队的国际化、研究范围的普及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等特征 在学科蓬勃发展的同时 也存在诸多问题 例如理论基础的薄弱、比较法的缺陷、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团队合作的矛盾、话语体系的建构等问题。

#### 1. 比较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受制于理论基础的薄弱

任何学科的长足发展必定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论基础上的。在学科发展过程中 虽然有一些知名学者如阿什比、阿特巴赫、伯顿·R·克拉克等人将生态学理论、依附理论、组织理论等运用到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中 但这些理论被引入以后并没有进一步得到批判、修正、完善和发展 乃至构成自身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而导致研究视角获得了新的突破但理论发展却止步不前。理论建构的方法分两个步骤:一是批判,包括对理论的解释与评价;二是建构,包括理论的修正与拓展<sup>[38]</sup>。一门交叉学科的发展不能仅仅寄希望于研究视角或研究方法的新颖,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也是必然路径之一,在借鉴过程中要善于对理论进行反思与批判,从学科的使命、意义、目的等角度修正、改造与建构理论,使之臻于完善。比较高等教育学科的理论发展与建构亦是如此。

#### 2. 比较法的局限性是阻碍比较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因之一

“没有比较的思考是难以置信的” 但任何研究方法都有其局限性 比较法也不例外。列宁指出“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相比 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它方面。”<sup>[39]</sup> 比较教育研究容易忽视教育

的内在演进<sup>[40]</sup>。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主要是运用比较法来研究高等教育的 而高等教育自身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 孤立地比较中等教育以后各级各类教育中的某些要素 势必会忽略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其他要素 而且特定的比较对象也受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制约 所以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相对的 其有效性和真实性还有待在现场实践中检验或证明。“比较”不仅是一种方法 还是一种思维方式 在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中 应正确理解这种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可运用辩证思维、逻辑思维、系统思维等 适当吸收系统论的方法 这样可以有效弥补方法论本身的缺陷。事实上 伯顿·R·克拉克的多学科研究范式就在试图克服单学科比较法的局限性。

#### 3. 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增加了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难度

当前 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范围已经延伸至第三世界国家 大有覆盖全球高等教育之趋势 但在其研究深度上进展缓慢 大抵聚焦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国际化与留学生、大学治理、创新创业等热点问题。究其原因 一方面在于学科发展早期的应用性目标定位;另一方面 在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性。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可能要小于经济系统或政治系统 可是它的复杂程度却更加独特 更莫可名状<sup>[41]</sup>。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者往往只关注高等教育的功能性和应用性方面 以满足社会之需 这就忽略除此之外更广泛的研究空间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重要因素。从一些学者对学科发展的反思来看 比较高等教育的理论拓展与建构已被提上日程 这说明应用性不再是学科发展的唯一动力 揭示高等教育复杂系统中的规律也是重要任务之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是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及其理论建构中不得不解决的难题 对研究者来说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挑战 直面应对这一挑战有赖于学术共同体的勇气与担当。在这一方面 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前辈学者为后辈树立了良好的学术典范。

#### 4. 国际研究团队的合作问题严重影响了比较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质量

在比较高等教育学科的反思与建构中 许多学者提出了由于研究团队国际化而带来一系列的合作困难 包括语言障碍、思维方式、方法论差异、表达形式等 这势必会降低研究成果质量或偏离预定的研究目标。高质量的优秀研究成果是比较高等教育学科产生重要学术影响的依据 虽然各国研究者在国际研究中保持一种包容、理解的合作态度 但民族文化的差异、思维理念的不同会对研究思路、方法和最终的成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很多研究项目也因此而不得不中断。正如乌尔里希·泰希勒所说“对于一个合作的比较调查研究中所需要的联合的平行活动而言 要想达成一个充分的概念一致或恰当的妥协 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sup>[42]</sup> 令人欣喜的是 不少致力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并没有因此气馁与退缩 他们乐于接受这些困难的挑战 并在合作中

为达成研究目标而努力避免冲突、化解隔阂。目标一致,达成目标的手段可以多样化,在其过程中需要国际合作研究团队秉持宽容理解、求同存异的原则,这样可以把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中遇到的合作风险降到最低点。

#### 5. 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

我国正处于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话语体系的阶段,强调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故事”等<sup>[43]</sup>。在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中国话语是相对薄弱的,在20世纪70年代蓬勃发展时期,中国的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几乎停滞,21世纪以来,我国的比较高等教育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但更多的是“请进来”而“走出去”的较少,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极少,距离打破西方统治的话语体系格局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比较高等教育的话语体系应该是多元的、包容性的体系,当前在研究范围上有了较大的拓宽,第三世界和一些欠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就表达的话语体系而言,仍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的多元化是比较高等教育学科的重要特色,其中,中国的比较高等教育学科话语体系应注重表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从寻求解决自身面临的国际问题出发,“既重视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基底,又开放吸收西方现代话语的合理成分;既具有科学的严谨性和逻辑的说服力,又具有道义上的国际感召力;既能使理论话语解释现实的国际问题,又能够为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指明方向”<sup>[44]</sup>。

#### 注释:

- ①关于“高等教育”的定义,此处采用《教育大辞典》中的界定,即“中等教育以上程度的各级各类教育的总称”,意图表明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对象不仅有大学,还包括社区学院、技术学院、师范学院等。
- ②国内关于该书出版时间的记载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例如潘懋元先生在《比较高等教育的产生、发展与问题》一文中指出“1843年德国休伯(V. A. Huber)的《英国大学》就是一本对国外高等教育描述性的专著。”追根溯源,该则史料来源于阿特巴赫的《比较高等教育》中文版第8页,通过中英文版《比较高等教育》的比较发现,中文版本中的译文没有问题,阿特巴赫在英文版《比较高等教育》中就认为休伯的《英国大学》是1843年用德语出版的,详见由Philip G. Altbach著、伦敦曼塞尔(Mansell)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Trends and Bibliography中的第6页。事实上,英文版两卷本的《英国大学》(The English Universities)确实是1843年出版的,但是德文版两卷本的《英国大学》分别是1839年和1840年由德国卡塞尔的J. C. Krieger's Verlags书店出版。

#### 参考文献:

[1]易红郡. 战后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M]. 长沙: 湖南师

范大学出版社, 2012: 58.

- [2] [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 比较高等教育[M]. 北京: 文化教育出版社, 1985: 9.
- [3] [4] [11] 潘懋元. 比较高等教育的产生、发展与问题[J]. 上海高教研究, 1991(3): 29-36.
- [5] 吴薇, 熊晶晶. 十年来我国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述评[J]. 大学: 学术版, 2011(12): 53-61.
- [6] 武学超. 21世纪西方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主题与启示[J]. 外国教育研究, 2011(7): 1-5.
- [7] [8] 王承绪, 顾明远. 比较教育: 第5版[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28, 31-35.
- [9] Sheila Slaughter.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al Sociology and Postmodernism [J]. Higher Education, 2001(41): 389-412.
- [10] Anna Kosmützky. Comparative Research, Higher Education [EB/OL]. [https://link.springer.com/reference-workentry/10.1007%2F978-94-017-9553-1\\_175-1](https://link.springer.com/reference-workentry/10.1007%2F978-94-017-9553-1_175-1). 2017-11-29.
- [12] [俄]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16卷·书信[M]. 周圣, 单继达,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58.
- [13] T. Campbell. Proposal of 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in a Letter to Henry Brougham [N]. The Times, 1825-02-09(1).
- [14] 袁传明. 近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以伦敦大学百年史(1825-1936)为个案[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66.
- [15] V. A. Huber. The English Universities (Vol. I) [M]. An Abridged Translation, Edited by Francis W. Newman. London: William Pickering, 1843: v.
- [16] 施晓光. 美国大学思想论[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44.
- [17] Charles Franklin Thwing. The American and the German University: On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8: 231.
- [18] Abraham Flexner.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M].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x-xii.
- [19] 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国教育丛书》编辑组. 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 2.
- [20] [英]阿什比.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 滕大春, 滕大生,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 7.
- [21] Eric Ashby. Universities: British, Indian, African: A Study in the Ec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 [M]. London: The Weldenfeld and Nicolson Press, 1966: 4.
- [22] [美]克拉克·克尔.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 王承绪,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5.
- [23] [以]约瑟夫·本-戴维.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M]. 赵佳苓,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302-303.

- [24] H. J. Perkin. Book Reviews: Centers of Learning: Britain, France, Germany, United States [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1979(5): 684 – 686.
- [25] 王长纯. 超越“边缘与中心”促进中国比较教育理论的新发展: 阿尔特巴赫依附论的因革观分析(论纲) [J]. *外国教育研究*, 1999(6): 8 – 13.
- [26] 刘淑华 杨旭. 再评高等教育依附理论——基于印度近30年来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现实[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6): 89 – 96.
- [27] 王承绪, 主编. 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 王承绪, 等 编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III(译者序).
- [28] [41] [美]伯顿·R·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 王承绪, 等, 译.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239, 313.
- [29] 张渭成. 国外教育学科发展概述[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2: 189.
- [30] Ulrich Teichler.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Potentials and Limits [J]. *Higher Education*, 1996(32): 431 – 465.
- [31] Francisco O. Ramirez, Dijana Tiplic. In Pursuit of Excellence? Discursive Patterns in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J]. *Higher Education*, 2014(67): 439 – 455.
- [32] Jussi Välimaa, Terhi Nokkala. The Dimensions of Social Dynamics in Comparative Studies on Higher Education [J]. *Higher Education*, 2014(67): 423 – 437.
- [33] Osmo Kivinen, Risto Rinne.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 [J]. *Interchange*, 1998(29): 121 – 136.
- [34] Jussi Välimaa. On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J]. *Higher Education Dynamics*, 2008(24): 141 – 155.
- [35] Emanuela Reale. Challenges i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the Use of Quantitative tools in Comparative Analyses [J]. *Higher Education*, 2014(67): 409 – 422.
- [36] Anna Kosmützky, Georg Krücken. Growth or Steady State? A Bibliometric Focus o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J]. *Higher Education*, 2014(67): 457 – 472.
- [37] Dale Bagshaw, Margret Lepp, Cecelia R. Zor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Building Teams and Managing Conflicts [J]. *Conflict Resolution Quarterly*, 2007(4): 433 – 446.
- [38] Elizabeth Steiner. *Methodology of Theory Building* [M]. Sydney: Educology Research Associates, 1988: 2.
- [39] 列宁全集: 第8卷[M]. 中央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423.
- [40] Friedrich Schneider, et al. The Immanent Evolution of Education: A Neglected Aspect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61(3): 136 – 139.
- [42] Ulrich Teichler. Opportunities and Problems of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the Daily Life of Research [J]. *Higher Education*, 2014(67): 393 – 408.
- [43] 翟博. 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话语体系要有新思维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5(6): 3 – 5.
- [44] 张志洲. 提升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的话语体系构建 [J]. *红旗文稿*, 2012(13): 4 – 7.

##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Concepts of Discipline ,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Realistic Dilemma

YUAN Chuan – ming

( Yangzhou University , Yangzhou 225002 , China)

**Abstract:**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refers to a highly applied cross – discipline with the use of comparative law to study the basic problems of all levels and hot issues in the world , which has cross – disciplinary , cross – cultural and cross –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the reference ,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reflection construction. Its methodology comes from comparative education , but it can also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vision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weak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 the defects of comparative law , the complexity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 the contradiction of teamwork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 which pose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Key words:**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 complexit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